

司马迁的
微小说

李永炽 / 编著

史记



李永炽 / 编著

司马迁的微小小说

史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司马迁的微小说：史记 / 李永炽编撰.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057-3034-2

I. ①司…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908号

本书经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限在大陆地区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书名	司马迁的微小说——史记
作者	李永炽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8.5印张 180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034-2
定价	28.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

◆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

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并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

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情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 《泽畔的悲歌》（楚辞）；
-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出版的话

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

◆ 高上秦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物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缤纷灿烂地造就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可是，生为这个文化的传承者——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亲民爱人、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单说我们的莘莘学子、读书人，在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

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遑论其他？

特别是近年以来，升学的压力，耗损了广大学子的精神、体力；西方文明的风行，导引了智识之士的思虑、习尚；电视、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行，更造成了一个官能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美国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固然使这一现象鲜明化，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优势文化”的辐射圈内，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

何况，近代的中国还面对着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自内在而言，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不断开展对西方经验的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气风发地营造了我们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疾风骤雨般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差不多八十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曾对我国教育作过一次深入的探访。在报告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文化

人类学所剖示的，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支援意识”的能源；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这里，在我们回溯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我们也都看到，每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颠沛造次，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乃至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是曾经编选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

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为全民所共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义——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

为此，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流畅生动外，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并且是长期居住或成长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现实有适当的理解与同情。在此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蕴义。

毕竟，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阅读力的年纪，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读者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为友，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而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才不会是一句口号。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恳盼，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创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都能喜爱它、阅读它。

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它的包容与广大，每一时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它们或惊或叹，或悲或喜，或温柔敦厚，或鹏飞万里，虽然形式多端、要求有异，却丝毫不

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尽可能地多样化与典范化。像《四库全书》对佛典道藏的排斥，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经济探讨、敦煌遗墨，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

就这样，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历史价值的肯定、多样内容的考虑下，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选择了目前呈现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之所以采用“经典”二字为这五十八部书的结集定名，一方面是依《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的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条理。另一方面，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它们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一些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恢弘壮丽，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

与这个信念相表里，我们在这五十八部经典的编印上，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对这套经典，我们是一体同尊的，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我们企冀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无论是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还是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都已扭曲了它们的形象，阻碍了可能的欣赏，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谛旨了。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当然，这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

也是在这种实质的，阅读的要求下，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取舍，有所融会与变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新版的《帝王的镜子》做了钩玄提要的梳理，形式也类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提供了一份非专业认知。其他的部分经典，也有类似的写法。这方面，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远的不谈，就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来说，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索麦维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做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书最少的老子《道德经》，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短短五千言，我们却相对地扩充、阐释，完善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体裁富丽，笔路万殊，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过个别的协调，分别做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交互运用，以便充分发皇原典精神，又能照顾现实需要，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

无论如何，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知识成果。我们明白，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我们都寄予了最高的尊重。

除了经典的编撰改写以外，我们同时搜集了各种有关的文物

图片千余帧，分别编入各书。在这些“文物选粹”中，也许更容易让我们一目了然地感知到中国：

那样朴素生动的陶的文化，刚健恢弘的铜的文化，温润高洁的玉的文化，细致优美的瓷的文化；那些刻写在竹简、丝帛上的历史，那些遗落在荒山、野地里的器物；那些随意笔动的书法，那文章，那绘画……正如浩瀚的中国历代经典一般，哪一样不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哪一样不是先民们伟大想象与勤恳工作的结晶？看起来，它们是一幅幅独立存在的作品，一件件各自完整的文物，然而它们每一样都代表了中国，都焕发着中国文化绵延不尽的特质。它们也和这些经典的作者一样，是彼此相属、相生、相成的。

这套书，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循序渐进，自浅而深。但愿我们的读者，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沛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

历史在期待。

经典三问

——简体版编者前言



展现在你面前的这套书名曰《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乃是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计得书五十八种，分别由五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编撰。

这是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当年慨然以一社之力，不计成本，聘请一流专家撰写的一套传承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书。

我们认为，这套书中文简体版的隆重面世，回答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民众教育中一个被疏落已久的大问题——“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样的经典？怎样读经典？”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这是南宋文天祥殉国之时的一句话。

文天祥的故事，中国人都熟悉得很，从民国时期的电影戏剧到现当代两岸的蒙童教本，都构筑了这样的记忆：文丞相是光荣的，可佩的，甚至对男儿来说：那一份忠勇和慷慨也是人性魅力的一个要件。吾土吾民——国格，人格，性格，与骨子里的圣贤书缘是有关系的。